

陈其尤、黄鼎臣与中国致公党组织的恢复 及历史方向的根本转变

陈昌福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摘要:1941年12月日寇占领香港,致公党中央组织陷于瘫痪。抗战胜利后,原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陈演生及黄鼎臣等同志,力排干扰,于1947年5月成功地在香港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恢复了致公党的组织活动并实现历史方向的根本转变。此后,中国致公党开始踏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今年恰逢致公党三大召开60周年,特撰文,以志纪念。

关键词: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组织恢复;转折点

中图分类号:D6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11(2007)01-0039-12

一、致公党组织恢复的历史背景

抗战胜利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今后应该建成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斗争非常尖锐。同时,经受八年抗战锤炼的爱国民主事业奋斗的中国民主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世界民主潮流的推动下,普遍觉悟到必须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强烈要求实现国家民主化,要求让人民参政,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力。他们积极开展各种政治活动,希望通过和平道路实现中国的政治改革,把中国逐步建成为一个民主政治国家。

在抗战胜利后的历史条件下,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5月的8个月间,在重庆、上海、广州先后创建或组建一些新的民主政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年10月,重庆上清寺“特园”)、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6年4月,广州)、民主建国会(1945年12月,重庆)、中国人民救国会(1945年12月,重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上海)、九三学社(1946年5月,重庆)。而另外一些建立较早的政党,为了适应战后国内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从1944

年下半年开始也先后进行改组或恢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改变党派联盟性质而于1944年9月改组为民主同盟,1945年10月在重庆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于1947年2月在上海召开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针对1945年前后原有的民主政党改组和发展,新的民主政党纷纷成立的情况,原中国致公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也在酝酿恢复致公党组织。另外一些自致公党“一大”存堂建党以来,依然在党内留存的洪门山堂则以洪门组织为基础也在筹建新的政党。由于中国致公党总部已停止活动多年,致公党元老之一司徒美堂便于1945年3月于纽约召开“美洲洪门恳亲会”。会议决定将洪门致公堂改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大会选举司徒美堂为党的全美总部主席。这次组党,虽然坚持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大方向,但对刷新党务并无多大实际意义。无论在政治上或组织上都没有收到什么成效。1946年夏,洪门九龙山红旗老五兼五圣山智松堂樊崧甫以全国洪门组织为基础,组织“中国民生共进党”,发表成立

收稿日期:2006-11-23

作者简介:陈昌福,男,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教授,致公党上海市委原副主委。

宣言及政治纲领,以政党姿态涉足当时的民主政治运动。未几,在国民党军统的干预下夭折。1946年,司徒美堂又欲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结合国内外洪门组织成立全国性的洪门政党。然而,司徒美堂的组党活动早就为中统特务组织所注意。中统头子陈立夫决定将计就计,派遣大批特务混入洪门内部,于8月1日以突然袭击方式,通过多数表决途径,成立了“中国洪门民治党”,旋又排挤以司徒美堂为首的来自美洲的洪门人士。司徒美堂情知上当,便于1947年7月宣布脱离“民治党”,转道香港重返美国。

在司徒美堂两次组党同时,原致公党中央干事会领导人陈其尤以及黄鼎臣等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在重庆就为恢复致公党组织而努力。1946年他们从重庆到香港后,与坚持在香港工作的原致公党领导和有影响的老党员陈演生、严锡煊、钟杰臣等汇合着手恢复组织工作。

陈其尤(1892~1971年)又名陈定思、陈丽江,广东海丰人。早年毕业于广州博济医学堂。1911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黄花冈起义及光复惠州之役。辛亥革命后赴日本留学。1916年毕业于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回国后在北方政府财政部任职。1917年后历任粤军总司令机要秘书,福建东山、云霄两县县长,潮梅、汕头海关监督兼海关外交特派员等职。1925年,美洲致公堂改堂为党。1926年2月,党的活动中心以“致公俱乐部”名义从旧金山移至香港开始推进党务事宜,陈其尤即为创办人之一。1931年在香港召开的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致公党中央负责人之一。1933年陈炯明逝世后,实际上主持致公党中央工作。抗战期间,陈其尤曾分别在重庆、广东、香港等地支持和参加抗战工作,并与中共和民主进步人士有过交往,对国共两党都有较深刻的认识。陈其尤原来的政治立场是拥蒋。他和蒋介石早年在北伐战争前的粤军中相识,私交不错,曾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驻立香港。但陈其尤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活动中,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又颇多不满,并因揭发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从军火生意中获取大量回扣,大发“国难财”而触怒蒋介石,被囚禁在息烽集中营,1941年被移解到重庆改为软禁,只允许在市区范围内行动。被软禁的陈其尤在重庆偶然碰到了在重庆挂牌行医的黄鼎臣,并通过黄鼎臣与中国共产党有了接触。

黄鼎臣(1901~1995)是陈其尤的海丰同乡。黄鼎臣的大哥与陈其尤是把兄弟。黄鼎臣于1921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就读于东亚高等预备学校。1923年考取日本医科专门学校(后改为日本医科大学)。1927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毕业,取得在日本行医资格。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北伐军北伐,一手在济南制造“济南惨案”。留日学生在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下,成立“反日大同盟”,推动整个日本的反帝运动。黄鼎臣被选为“反日大同盟”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1928年夏被日本警视厅遣送回国。回国后的黄鼎臣立即参加“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工作,继续从事反日宣传活动。9月,国民党当局与法租界巡捕房勾结,逮捕了黄鼎臣。1932年底出狱,因联系人叛变,从此失去了与中共组织的联系(后于1956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出狱后的黄鼎臣先后在澳门、广州、桂林、昆明等地行医。1940年到重庆,除设立诊所挂牌行医外,还担任《新华日报》社的医药卫生顾问,为报社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治病,其诊所也成为中共转藏书籍、文件以及和民主进步人士秘密开会地点。在重庆期间,黄鼎臣一个很大的贡献是利用他与陈其尤的老关系,在中共和致公党间牵线搭桥做了大量工作,从而使陈其尤对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渐有了认识,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这对于后来致公党组织的恢复和历史性转折,以及参加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2年3月,司徒美堂从美国转辗抵达重庆。蒋介石竭尽全力拉拢司徒美堂,中国共产党也在积极争取他。为配合中共工作,黄鼎臣建议陈其尤以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名义,主动与司徒美堂接触,使司徒美堂对国内情况有了了解。司徒美堂返美后,广为宣传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艰苦奋斗,动员组织广大华侨以各种方式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

二、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准备工作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释放了陈其尤。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香港不在国民党政府管辖之内,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躲避蒋介石的迫害,为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先后到达香港。1945年底,陈其尤回到香港与坚持在港工作的致公党秘书长陈演生等同志一起恢复中央干事会的日常工作,并投身民主政治运动。

陈演生(1875~1952)也是广东海丰人,清末秀

才、同盟会员。1912年任广东五华县知事,卸任后,在广州、新加坡等地参加倒袁护法运动,为此,曾两次被捕入狱。1918年至1920年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政务处长,后长期在香港经营企业。陈演生是1925年致公党成立后便从事党务工作的老同志。特别是致公党总部迁香港后,几经战乱,他仍将致公党中央总部的档案材料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和许多致公党的海外组织保持联系。这是后来成为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基础。1941年12月日寇占领香港,陈演生始终坚持爱国立场,拒绝日本侵略者的拉拢收买,竭力反对粤军的一些旧军人附敌求荣的叛变行为。香港沦陷后,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但陈演生仍以中央干事会秘书长身份联系和动员各地致公党组织和党员为祖国的抗日战争作出贡献。香港沦陷前后曾协助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脱离香港或隐蔽。香港沦陷后,又多次为东江纵队输送物资和药品。陈其尤抵达香港后,积极协助陈其尤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开展整理党务工作。

但是,恢复致公党组织的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国民党在广东的挺进队曾派人到香港对陈其尤进行拉拢。因陈其尤不予理睬,他们在《华商报》上发布了一个纯属子虚乌有的“中国致公党华南总支部”的消息,混淆视听,妄图取代以陈其尤为首的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这个阴谋不仅没有得逞,反倒促进了陈其尤同志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进程。1946年4月,陈其尤邀请正在广州的黄鼎臣到香港参加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会议。在会上,黄鼎臣详细介绍刚结束不久的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战胜利后的时局,指出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致公党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中间党派没有中立余地。黄鼎臣建议中国致公党应当参加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干事会成员的赞同。会后,黄鼎臣由陈其尤介绍加入了中国致公党,并积极参加恢复致公党组织工作。

从1946年至1947年4月,陈其尤等为恢复致公党组织作了大量工作。主要有:

第一,恢复了致公党总部。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等负责内部事务及与中共、各民主党派进行联系;由陈演生等负责以总部名义同海内外各地组织取得联系,沟通恢复致公党组织的意见,便于有效地组织和领导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第二,以致公党总部名义向社会公开表明致公党的国是主张。1946年7月6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在香港《华商报》发表《致公党组织概况》,向人们介绍致公党的演变历史,肯定了致公党对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贡献,说明其政治纲领和国是主张,即:主张地方自治,以省为最高自治单位,中央与地方取均权制;反对一党专政与地方割据;反对任何党派拥有军队,实行军队国家化;主张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以和平方式协商,求得政治合理的解决;向海内外发出呼吁,为适应战后的民主潮流和新局势,准备迅速筹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党务,修改党章与政纲,选举中央干事,进行组织上的改组。《概况》发表后很快得到美洲、南洋一些组织的拥护和响应。中央干事会恢复了同五大洲致公党组织的联系,各地组织成立“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中央干事会组织人力起草党纲党章及其他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等。

第三,积极投入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致公党在积极恢复党组织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投入了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斗争。从1946年7月至1947年初,国民党政府先后发动了全民内战、召开伪国大、与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出卖国家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允许美国继续占驻中国。对此,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公开地表明自己的立场。1946年11月2日,在国民党片面宣布召开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的前夕,中国致公党发表了《对时局意见》,提出应该按照政协决定,由改组后的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宪草亦应根据政协修改原则,由宪草审议委员会起草全部条文,以备制宪的国民大会采用;指责执政党不顾政协决议,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此种举措确可能引起全国分裂之危险;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其对华错误政策,撤退驻华美军,停止助长中国内战之一切物资援助,并声明本党愿与为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任何党派携手合作。

1947年2月27日,中国致公党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继续其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包办国民大会而造成的通货膨胀、金融动荡、商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状况,发表《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取消“钦定”的伪宪法,立即实施关于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四项诺言,立即释放除汉奸外的一切政治犯,然

后由国共双方协商全面停战,实现和平。扩大党派协商会议,遵循过去政协路线与精神,解决国是。《宣言》还谴责国民党政府未能采取有效的护侨政策,纵任各地侨胞的生命财产遭受当地政府之残害,如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地尤为显著。为广大海外华侨的利益奔走呼号。

此外,中国致公党在这一时期,还一再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政府内战的错误政策,是中国社会不安、民族危机的总根源。因此,强烈要求美国改正其对华政策,立即撤退所有驻华的军队及军事训练人员,在中国普遍的和平未实现以前,各国不得再对中国政府或任何一政党进行经济援助,任何国家都要遵守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约束。

致公党在上述文件中,还表示愿同其他爱国党派携手,为实现和平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努力。致公党对国是问题的主张和态度,对美蒋是个重大冲击,对中共是一有力支持,也扩大了致公党在国内外的影响。这一切表明,中国致公党从中央到各地组织的工作已经恢复,它已成为民主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至此,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方向的根本转变

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筹备,1947年5月1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有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劈寰)、雷荣珂(雷迅、田凡)、钟沃梅(钟杰臣)、肖重光等四十余人。大会讨论修改了致公党的《政纲》和《党章》,发表了《宣言》、《告海外侨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文》。会议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组织上的改组,基本上结束了此前党堂不分、党堂并存的格局,实现了党堂在组织上的分离。

据黄鼎臣同志回忆:“‘三大’实际是1947年4月下旬召开的,四月底已经闭幕了。但公开宣布‘三大’召开的日期却是五月一日,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会上要求陈其尤给蒋介石写一封公开信,在报上发表,要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要和平民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封公开信没有发表,‘三大’又已经开完。发表‘三大’文件的时间拖后,所以会期变成五月初了。”“会场就在香港跑马地,是在严锡煊的家

里。严的家当时是致公党的办事处,门口挂了个四方形的铜制牌子,上书:中国致公党。会是在楼上开的。(中共南方局的)连贯同志……关怀并指导了会议。李济深也出席了‘三大’”。“当时的局势还是十分紧张的,国民党的特务到外活动,所以会议还是秘密召开的。但为了表示同心同德,仍然搞了一次歃血为盟。”^[1]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纲》,全面地反映了致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张和要求。《政纲》规定:“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而奋斗。”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任何个人、任何党派所不得而私。反对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必须在普选的条件下,融合各党各派建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为保障民主、国家政体采取民主集中制,由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组织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中央政府采取内阁制,实行中央、地方均权制,省为最高自治单位。《政纲》规定了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实行全国计划经济;人民有经营企业的自由,劳工利益受法律保护;反对国营事业的官僚化与私人企业的独占化;奖励侨胞向国内投资,并保障其合理利益;利用外资提高发展生产力,但必须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完整;计划发展轻重工业,配合农业生产,使中国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逐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保障佃权,扩大农业贷款,严禁高利贷盘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由政府大兴水利,奖励集体经营农业,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政纲》还主张设立侨务机构,实行护侨政策;运用外交手段向所在国交涉,废除对我国侨胞的不平等法律,保护侨胞的权益;海外侨胞遭生命财产损失时,政府应向有关方面提出赔偿,并予以救济;帮助侨胞加强团结,加强侨胞与祖国的联系;鼓励侨胞向国内投资,予以最惠权益;奖励侨胞回国服务,奖励侨胞子女回国就学;增加侨胞国民代表名额,以扩大侨胞的参政权。此外,《政纲》还在财政、军队、外交、教育与文化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政纲》中的土地政策,原先的提法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后来听取了中共华南局连贯同志意见后,才改定为“耕者有其田”。据原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伍觉天1994年在《从事致公党工作46年》中说:连贯同志“对致公党这次会议帮助很大,特别指出‘致公党是与华侨有紧密联系的,在当前的战斗任务应该是切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

“致公党是第一个在香港公开活动的民主政党，一举一动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一切的公开文件都要慎言，不然就会受到损失”。连贯同志对致公党“三大”章程草稿中写着“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提法认为“应该慎重考虑。华侨地主原来很少。抗日期间侨汇不通，许多侨眷生活艰苦，为饥饿所迫，四处流亡，死人甚多。抗战胜利后，许多华侨用侨汇购买了一些土地，但不是以剥削农民所得为生活来源。他们有的并没有收地租。对这些土地，也同样收归农民的，但对待华侨地主与对待其他地主会不一样的，其具体提法，当另作规定”。因此，连贯提议，在致公党文件中还是写成“耕者有其田”为宜，才不会引起华侨误会，才有利于团结，在其他地方都要根据华侨的特点来写，不要有有损华侨情谊的提法。

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回顾了自1925年成立以来秉承致公党爱国反帝的爱国精神，支持和参加祖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历史后，遣责国民党中的少数买办官僚、封建军阀，为维持其独占的统治地位，撕毁政协决议，借和谈为烟幕，借制宪为幌子，扩大内战的罪行。造成“今日中国国家与民族所存在之危机，实为有史以来所未有”。以言政治，则独裁专横，特务肆虐，仇视人民，贿赂公行，无官不贪，无吏不污，鱼肉人民，无所不至；以言经济，由于中美商约的签订，使全部民族工商业摧毁殆尽，少数买办阶级利用政权以垄断国内外贸易而自肥，农村壮丁因服兵役而离开农村，使生产减少，土地荒芜，加以国民党政府的征实、征借、征购政策，使农业陷于破产；以言财政，物价高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为维持内战军费，滥发巨额纸币，通货无限膨胀；以言社会，则贫富悬殊，买办官僚穷奢极欲，而一般人民则无以为生，饥寒交迫，盗匪遍地，饿殍遍野。而造成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之独裁包办与内战之扩展不已”，若内战能即行结束，则一切问题均易于解决，为此《宣言》提出解决当前国是问题，实现民主政治、结束党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六个步骤。

第一步，国共双方军队应即退回去年1月13日停战命令发布前之两方原占地区；第二步，重新召开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过去未参加会议的民主党派，亦应请其参加；第三步，由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产生各党派平等联合之政府，以代替目前非依政协所产生的国、民、青三党联合政府；第四步，由联合政府制

定国民大会选举法，使人民依此选出真正的代表，组织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正式宪法，以代替伪宪法；第五步，根据新宪法规定，正式选举民主政府；第六步，新民主政府成立后，召集各地各级民意机关，由各级民意机关选举各级地方政府。

《宣言》着重指出：“中国所有一切重要问题，在政治未能实现真正民主之前，则毫无根本改善之方法；若政治果能真正实现民主化之后，则一切困难皆可迎刃而解。”因此，致公党宣言决心要“为中国政治向真正民主化而奋斗到底！”

大会发表的《告海外侨胞书》号召：“我海外侨胞一心一德，共策进行，认清前提负起责任，务使国民党之腐化独裁局面，早日消灭，各党派联合民主政府，迅速实现，庶内战停止民生安定”，“海外侨胞方能快睹祖国富强与世界各国同享平等自由之幸福。”

5月15日代表大会发表《致杜鲁门总统电文》，要求美国改变对华的现行政策，停止军事援蒋，指出：“现时中国民众皆认为美国是主要助长中国内战之责任者，若无美国支持反民主之国民政府对中国的民主势力作战，则和平与民主政治的中国，今日必已实现无疑”。文章呼吁杜鲁门“即时决计撤退所有驻在中国之美国军队及其他一切军事人员，同时停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之所有物质援助。中国问题，应听由中国人民自行解决。”

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对致公党的建设作了许多原则性的规定，指出：致公党“信仰民主主义”，“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内革命运动”，“对一切损害本党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者进行斗争”，《党章》规定致公党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党内各级机构的负责人，概由普选制产生”，“凡党员必须服从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党章》还规定了在必要时必须对党员绳之以纪律，对地方党部进行改组或全部解散。由此可见，致公党的指导思想已由旧民主主义上升到了新民主主义的高度，解决了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等重大问题，成为一个新型的现代政党。

为进一步发动致公党成员和海外侨胞投入国内的革命斗争，大会决定出版《公论》作为致公党中央机关刊物，以发表致公党中央对时局的评论及政治主张。1947年12月《公论》创刊号出版，其发刊词说：“为挽救当前国家民族之多难，力求中国‘和平’

与‘民主’之实现”，“为适应时代之潮流，爰以一己之致诚，阐扬‘和平’与‘民主’之真义，出兹刊物以问世，藉以激励国人”，“取名‘公论’，是亦本‘万几决于公论’之意云尔”。

最后，大会还在组织上进行改组，决定改总理制为委员会制，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执委会正式委员19人，候补委员6人，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雷荣珂、钟沃梅、肖重光、严锡煊、韩毓辉和伍觉天等9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大会推选李济深为主席（1948年1月1日民革成立，李济深被选为主席。从全局出发，致公党只能割爱，主席担子被历史地落到了陈其尤肩上），陈其尤为副主席，主持中央党部日常工作，陈演生任秘书长，黄鼎臣任组训总长、雷荣珂任宣传总长、钟沃梅任财务总长、韩毓辉任代理侨务部长。设立了香港、马来西亚、美洲三个总支部及二十多个分部。

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它由一个松散的海外华侨的政党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华侨政党。在政治上，不再以含糊不清的“复兴民族”、“忠诚救国”等口号为号召，而比较明显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任务，以民族解放、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使国家富强、人民自由为目标。表明致公党在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脱离了旧轨道，上升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度。在组织上不只是吸取了一批非洪门人士入党，而且还选举他们进入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使致公党从上到下，都有了新的血液，使领导机构比较健全而有活力。它使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党获得了新生。这是致公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致公党的历史方向发生根本的转折，开创了致公党历史上的新纪元。正如黄鼎臣同志所指出的：“这次代表大会是特别值得纪念的，因为它是本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本党由一个没落时期的旧民主主义的政党转变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政党。这次大会的政治决议表达了全体同志和所联系的群众要求祖国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愿望，并引导着我们党所联系的群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跟上伟大的革命时代奋勇前进”^[2]黄鼎臣还进一步指出：“中国致公党之所以能够真正转变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完全是因为有中央的影响和帮助。回顾致公党的历史，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廖承志、方方、许涤新、连贯等都对致公党的工作给了很大的帮助和指导。”“所以我常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致公党”^[3]。

四、积极推进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为在海内外广为宣传中国致公党的政治主张，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反人民、打内战、搞独裁的罪行，教育广大党员和侨胞认清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抛弃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起到了积极作用。陈其尤在《公论》的创刊号上撰写《中国致公党之历史及其现在使命》，主动向社会各界介绍致公党的历史“自民国十四（1925）年成立迄今，几经时势之推移，人事之变迁，但救国建国之宗旨，始终如一，松柏岁寒，益见晚操。文章着重将致公党“三大”通过的新的政纲，“公告社会，以示本党努力之鹄的”明确宣布致公党“现在使命……即争取和平统一与争取真正民主政治二者是也”。文章特别呼吁：“允宜开诚布公，邀请民主各党派以及各阶层代表共商大计，仍走协商路线，尤当正视现实，特别尊重中共地位，大家携手，在民众监督之下，组织联合政府”，“此本党之所要求，誓当全力以赴之也”。

“三大”以后，致公党有效地组织和领导全党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政党加强团结合作，以各种方式支援国统区人民的革命斗争。致公党中央还动员和组织在港成员为在港的民主党派人士举行联合集会、座谈会、碰头会等做了不少会务和警卫工作。对于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致公党也积极作出反应，发表谈话和见解，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1946年6月蒋介石政府发动全面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仅经过一年的作战就扭转了战争的局势，使自己由防御转入进攻。在解放军进攻的锤击之下，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惊惶失措，并进行疯狂的挣扎。美国派遣魏德迈来华。国民党政府则急忙颁布所谓“勘乱总动员法”。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

1947年7月1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鉴于中国革命洪流势不可挡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派遣魏德迈为总统特使，率领考察团到中国进行调查，以谋求挽救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办法，寻求如何加强美援和发挥美援效能的措施，并加强对国民党政权的控制。

7月22日,魏德迈一行9人抵达南京。29日,中国致公党即发表为魏德迈特使来华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反动的根本政策,并未有任何改变”,它“一切表现的姿态,不外是美妙的烟幕,借此欺骗中国人民,并缓和中国人民,避免强大力量的反对,以实现其变中国为希腊、土耳其第二的企图”。强调“目前中国人民所最感痛苦而又坚决反对的,莫过于连年不断的内战,以及暗无天日的独裁专政,而最迫切需要的是实现和平团结及民主政治之实现,任何友邦人士若是违反了这一原则,借调解或调查之美名,而实现片面援助独裁政府,使中国内战愈益扩大延长,人民痛苦日益加深,这将遭受人民大众的坚决反对”。这不仅有害于中国人民,而对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也是不利的。

1947年7月,蒋介石国民党为了加紧消灭共产党,欺骗全国人民,提出“勘乱建国”的决策,7月4日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勘平共匪,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这个所谓《总动员法案》一面诬蔑中国共产党“拥兵割据,扰害地方”,“欲以武力颠覆国家”,实行“全面之叛乱”;一面标榜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政治解决之方针,不惜委曲求全,多方容忍”,说明它发动全面内战“实出万不得已”,“要求全国军民集中意志,动员全国力量”、“以全力铲除”中国共产党。接着,国民党政府到处征粮、抓丁、逮捕和杀害反内战反饥饿的工人和学生,镇压爱国民主人士。

为此,中国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8月19日发表了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总动员法”告全体党员》,坚决反对“总动员法”。它指出:“第一,总动员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扩大内战,要扩大内战,就不能不大大地补充其人力和物力,其内容就是加强征兵、征粮、征实和增税”,“不仅要使全国百姓牺牲百万的生命,而且附带的要被刮去老百姓数百亿元的金钱”,“而筑成政府当道少数豪门财富垒积的金字塔!”第二,除“对全体国民实行生命财产的总掠夺之外,更加紧束缚国民的思想、言论与行动。总动员法将使更多的民主人士被以‘共产党尾巴’的名义,遭受拘捕监禁和屠杀,国民生存的基本权利将荡然无存,将有更多的民主刊物被禁止出版,或被没收财产”,“政府将藉此将这些‘防民于口’的手段,加上伪装民主的色彩,以图欺骗民众而维持其少数封建

买办阶级的独裁!”第三,国民党政府假借“勘平共匪”和“与共产党作战”等名义骗取美国更多物资的援助,以挽救军事上的失败,“使内战更加扩大和延长,甚至幻想以此使其将要总崩溃的封建买办政权能永续下去。”

国民党政府在发布了“勘乱总动员法”之后,于7月9日下令撤消政治协商会名称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秘书处,完全扫除了旧政协时代的一切痕迹,随后又加紧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残酷迫害,一批著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积极活动的成员被殴打、监视,甚至逮捕、杀害。1947年10月27日,又下令解散中国民主同盟,并监禁、逮捕民主同盟的负责人和盟员。11月6日,陈其尤代表中国致公党发表《对民盟封闭问题之意见》,明确指出:国民党当局的此举即为今后对一切民主人士强施压迫的先声,使平素主张中国民主政治的正义之士都缄口结舌,而国民党反动派今后要坚持内战与鱼肉人民,即可以为所欲为了。表示本党为民主阵线之一环,站在友党与正义立场,对民盟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取缔这一举动及其领袖们为正义,始终不屈不挠的斗争,至表敬意,而深深寄以同情。益愿在艰难恶劣环境中,携手奋斗以争真正民主的实现。

五、响应“五一”号召,自觉接受中共领导

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以及联合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界同胞,“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8年4月30日,针对当时全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当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因受国民党的迫害,很多人前往香港进行民主活动。当他们获悉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后,异常振奋。5月5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民革)、沈钧儒、章伯钧(民盟)、马叙伦、王绍鏊(民进)、谭平山(民联)、蔡廷锴(民促)、陈其尤(致公

党)、彭泽民(农工党)、李章达(救国会)和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电报中说:“南京独裁者窃国卖国,史无前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桀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早宜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紧接着,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表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6月9日中国致公党单独在《华商报》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指出:“我们应该认识中共这个政治立场和态度是代表全国各革命阶级和一切爱国的民主阶层的,它与本党一向对国是的主张和奋斗目标也相符合”。“特为郑重宣言,完全同意中共‘五一’口号,忠诚地和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侨胞共同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现阶段革命的神圣的任务,使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召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中国!”宣言还特别强调“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这一“宣言”是中国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标志。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民大会”,会议选举了“总统”和“副总统”,并随即公布强化内战独裁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各民主党派在港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声讨所谓“行宪国大”,否认伪选举,致公党也在《公论》发表声明指出:“行宪国大”是丑态百出的“怪剧”,“号召本党海内外党员与亲爱同胞们,认清当前事实,为国族前途而作彻底反美反蒋反封建政权之奋斗”。致公党驻马来西亚总支部也在《为否认及声讨蒋介石伪总统告华侨书》中揭露蒋介石假借民意,实际上“使他自己成了实质的至高无上的皇帝”,“蒋介石独夫的罪恶,纵令罄南山之竹,亦难写其万一”,“全南洋的华侨以及祖国同胞,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实现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应该一致起来打倒蒋介石独夫的卖国政府”。

致公党在国内进行和平民主运动的同时,还十分注意争取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1948年初,美国各界人士举行“美国对华及远东政策大会”,致公党不仅于1948年1月20日“特函致祝”,而且告知该会,致公党也通知“旅美各地同志,对贵会予以全力支持与协助”。4月9日,致公党再次致电远东政策委员会,说:“贵会代表美国人民出而反抗反动政府之政策有如黑夜之灯塔……不胜感奋。……自信在世界人民通力合作之下,一切反动政策,都必归于失败”。年底,又致电加拿大温哥华哈黑法克斯海员工会、新加坡联合工会、美国码头及仓库工人联合会对他们拒绝运载军火来华的正义行动表示感谢。

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中国致公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争取民主的中国民主党派的一个重要成员,它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六、政治北上,中国历史即将进入新阶段

1948年10月23日,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返美离港前夕,中共南方局连贯同志设宴为老人饯行。席间,老人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原信签字盖章,认真严肃。10月30日,司徒美堂抵达美国后,又根据事先与致公党陈其尤等领导人的约定,在香港各报上发表了他在10月18日签署的另一份声明:《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明确表示“今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在《声明》中,司徒美堂以洪门老人身份呼吁洪门兄弟声援陈其尤等人继续组织的中国致公党,并认定“中国致公党之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司徒美堂返回美国后,在美国西部各城市唐人街广泛宣传祖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号召旅美华侨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并将美洲的“中国洪门致公党”改组为“中国致公党”。

与此同时,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亚子、茅盾、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由衷地表示赞同召开新政协。何香凝、刘王立明等香港妇

女界 232 人也联名发表宣言,热烈响应“五一”号召。1948 年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这是民主党派由爱国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民主党派公开宣布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重要标志。历史表明:凡是响应“五一”号召的党派都应邀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今天的民主党派。

对各方面的热烈反应,中共中央十分重视。1948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在复电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电文中说:“诸先生赞同敝党 5 月 1 日关于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当年,应邀出席新政协商讨建国大计,是以准备付出生命为代价的崇高爱国行动,需要很大勇气。冯玉祥在黑海罹难,杨杰在香港被暗杀都证明了这点。但是民主人士都无所畏惧,非常高兴和感谢中共中央对他们的邀请。自 1948 年 8 月至 1949 年 3 月间,他们先后分成 4 批在中共中央派往香港的钱之光和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等周密安排与护送下,乘船北上,到达大连,经由大连到达哈尔滨。另一部分民主人士从天津静海唐官屯过闸口,通过 30 里游击区,进入解放区边境的沧县,再从石家庄进入太行山,沿滹沱河顺大道到达河北平山李家庄(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民主人士分批陆续进入解放区,受到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民主人士齐集解放区,使得蒋介石政权在政治上陷入空前孤立。从此,中共与各党派协商筹备新政协就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应中共中央邀请,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与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周海婴)、沙千里、宦乡、曹孟居等民主人士,由连贯陪同,被安排在第二批北上,10 月底由香港出发,经丹东去哈尔滨。致公党主席李济深离港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是民主人士北上整个过程中最富有传奇性的。致公党的另一位领导人黄鼎臣也在中共华南局的安排下于 1949 年 3 月 20 日和其他民主人士搭乘英轮“宝通号”北上,

27 日到达天津转去北平。

1949 年 1 月 20 日,毛泽东致信致公党的耆老司徒美堂,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信中说:“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归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当时已是 83 岁高龄的司徒美堂因远在美国,虽较迟才接到此函,但毅然拒绝孔祥熙等人的劝阻,即刻启程离开了侨居近 70 年的美国,于 1949 年 8 月 13 日抵达香港。由于半年前,李济深、郭沫若、蔡廷锴、陈其尤等人的突然秘密离港,那些监视他们的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竟无所觉,这次司徒美堂来港,国民党人员加紧戒备,气氛就非常紧张。饱经风霜的司徒美堂泰然地吟了两句古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笑了之。在中共华南局的帮助下,仍按原计划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搭乘太古公司的岳阳轮经台湾海峡,于 9 月 4 日抵达北平,与先期到达的致公党代表陈其尤、黄鼎臣等一道参加人民政协,共商建国大计。

政治北上、军事南下。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云集解放区,使人民解放战争的预计进程大为缩短。1948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的估计是 5 年左右(从 1946 年 7 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到 1948 年 11 月 14 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说:“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事实证明,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深得人心。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人民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中国历史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七、中国致公党与人民政协

陈其尤到达沈阳后,于 1948 年 12 月 19 日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代表致公党全体党员向中共中央致敬,并表示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1949 年元旦,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这篇文章揭露了美蒋勾结玩弄假和谈的阴谋,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并且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

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了着推翻中国人民共同的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1月6日致公党发表了《最近对时局之声明》,拥护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要求蒋介石政府彻底解除一切武装,无条件投降。1月14日,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的《新年文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宣告中共和谈的八项条件。1月22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著名民主人士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他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可能。“人民民主阵营之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绝对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从此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一致正式地、明确地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彻底抛弃了所谓的中间路线,在中共领导下,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奋斗努力。1月28日,致公党再次发表《拥护毛泽东时局声明》。声明指出:国民党政府“明知大势已去,假倡和平,冀收拾余孽,为卷土重来之计”;毛泽东关于对时局的声明,“指斥南京反动政府和平阴谋,同时提出民主和平八个条件,词严义正,实为全国人民最低要求。”“兹幸中共领导人民革命,已近全面胜利,甚望彻底肃清反动残余势力,使中国得到真正和平民主”,“本党代表海外数十万华侨,仰望祖国和平统一、独立富强,自当同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到底,并盼国民党统治区内各界同胞一致主张为幸”。

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平攻势同时,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对美帝国主义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和妄图干涉中国革命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显示了致公党及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紧紧地站在一起,团结一致,革命统一战线十分巩固,这就使得美帝国主义不敢轻视中国革命人民的力量而突然采取冒险行动,也使得美帝国主义妄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既反蒋

又反共的“中间”政府的阴谋遭到彻底破产。

1949年1月30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原定于哈尔滨名开的新政协筹备会决定改在北平举行。1月31日已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吴晗、雷洁琼等15人前往北平,2月25日,李济深、沈钧儒等35人由沈阳乘“天津解放号”列车到北平,次日在北平市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诚恳地表示“全国民主党派都衷心地愿在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领导之下,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而贡献其可能贡献的力量”。在全国胜利前夕,中共把大批民主人士接回解放区筹备新政协,这一行动,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打下了重要基础。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提议。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参加这次会议共计23个单位,134名代表。会议选出2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推举毛泽东为主任委员,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委员,李维汉为秘书长。在筹备会开幕式上,毛泽东致词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洗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筹备会常委会领导下成立6个小组,分别进行以下工作:第一组,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名单;第二组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第三组起草共同纲领;第四组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组起草大会宣言;第六组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

经过协商,确定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代表是4人: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陈其尤参加筹备会第一和第四组工作,黄鼎臣参加第三和第五组工作,雷荣珂参加第二组。

在新政协筹备期间,曾有一些以党派、团体或个人名义来函申请参加政协,共有28件。为了保证新政协政治上的革命性与纯洁性,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协商,反复研究并认真甄别,既注意到政治上的严肃性,把握住不让反动分子参加的原则,又考虑到策略的机动灵活性,拓宽团

结的广泛性,使新政协成为代表全中国人民意志的协商会议。

自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误解,还在酝酿成立筹委会过程中,就有代表曾直截了当地对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说:“致公党没有资格参加新政协。你(指陈其尤)以个人身份参加,我们表示欢迎”。这一说法反映了一部分人对致公党缺乏了解乃至误解。

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的问题,由于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对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并同他们有密切的交往,因此,他亲自过问并列举了致公党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从而使这一问题很快就获得解决。他最后归结说:“致公党响应新政协最早,我们主张列入筹委会”^[4]。这铿锵有力、充满情谊的话语,不仅成功地进行了解释和说服工作,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致公党在中国革命中地位公正的评论。这一评价中也蕴含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根据致公党老人口述,在中共华南局领导下,致公党充分发挥自己在香港的优势和影响,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香港的活动提供方便,以及配合中共华南局护送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摆脱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安全离港等等;而有些即使是在香港的致公党总部也并不掌握。

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经过了三个月的积极工作,于9月17日举行第二次会议,从美国经香港奔赴解放区的司徒美堂正好赶上了这次会议。会议批准各项草案文件,同时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会议又通过了扩大代表名额的决定,由原来的510名增加到662人。其中,中国致公党正式代表6人,候补代表1人,他们是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陈演生因留守香港总部不能赴京。候补代表1人因故滞留广东东江。而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司徒美堂则作为华侨界代表出席会议。

当时,司徒美堂以什么身份参加新政协是一件极为复杂的问题,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协调和平衡下,从更广泛地联系和影响美洲华侨考虑,司徒美堂莫过于以美洲侨领身份参加新政协更为合适。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政协的领导机构,制定了国旗,决定了国都、国歌和纪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开幕式上,毛泽东致开幕词,他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9月24日,致公党的首席代表陈其尤在大会上发言,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实在是适合今天中国人民迫切要求的一件大事,又是中国人民历史上空前的创举。”“我们的国家今后应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这是使我们全国人民真正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的保证。”陈其尤在发言中所使用的词汇,虽然与今天相隔了50年,但它的内涵都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依然十分亲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届会议期间,中国致公党提出“近来国外各地政府排华,华侨生命财产和自由备受蹂躏,拟请大会提出严正护侨声明,并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案”的提案。这是这届会议中所收到的14件提案中,唯一以党派名义所提交的提案。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陈其尤等致公党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自己贡献。

[附]关于《公论》

中国致公党“三大”决定出版一个杂志作党中央机关刊物,但并未取名。1947年5月6日致公党三届中常委第一次会议就创办刊物问题作出决定:先办一个不定期的刊物,并责任雷荣珂和钟杰臣筹划办理。10月22日中常委第22次会议才为刊物定名《公论》。这一决定是与在港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士的想法和做法是一致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当时国内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为宣传民主,反对独裁,大造革命舆论。

《公论》从1947年12月1日创刊问世至1949年5月10日停刊,共出版6期。出版《公论》的宗旨和目的,见于《公论》发刊词:“当前政治日益腐败,贪污成风。内战扩大、民不聊生,无一而非封建政权与美帝国主义者勾结统治造成之结果。”“同人等兴念及此,不寒而栗!日夕思维,念以为今日挽救中国之方法,仍为一般国人所公认之‘和平’与‘民主’为唯一途径。国家和平若不实现,则无以保存国家之元气,民主政治若不实现,则无以肃清政治之腐败。有真正之和平,方可建立真正之民主;有真正之民主,方可获致永久之和平。是以‘和平’与‘民主’,不特为今后救国唯一之良方,且两者绝对不可分离者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全国同胞,苟不愿放弃时代所赋予之使命,应即奋起,一心一德,为挽救当前国家民族之多难,力求中国和平与民主之实现”。“为适应时代之潮流,爰以一己之至诚,阐扬‘和平’与‘民主’之真义,出此刊物以问世,籍以激励国人,并就正社会贤达,取名‘公论’,是亦本‘万机决于公论’之意云尔”。

“万机决于公论”一词源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明治维新时代。1868年明治政府在《檄奥羽士民书》中强调:“於兹大一新政令,与公卿列藩及四方之士,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天下之建国非一人之所得而私之!”以陈其尤、黄鼎臣早年曾留学日本而论,当不排斥“借用”之可能,而以《公论》为阵地,发表致公党对时局的看法、声明、文件等表明致公党的立场和观点。同时,《公论》也是作为致公党内对党员进行教育的阵地,发表致公党的重要文件,从而教育党员、统一思想。1950年中国致公党“四大”会上宣传部长雷荣珂在“三年内宣传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党原为华侨政党,华侨党员人数最为众多,而华侨党员的政治知识水准大都低下,若想他们了解目前国内外的政治状况和革命形势,则非大力施行党内的自我教育不可。因此,在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常委即开始筹备出版刊物籍以供给党员大众阅读,而为自我教育之用”。这一报告进一步肯定了《公论》是“党内良好的政治读物,而且由此使党外各民主政党与全国民主人士,都明了我党为一个有主义主张的革命政党”。

自以《公论》出版发行后,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反应良好。1947年12月21日在三届31次中常委会议上,陈其尤在谈到社会各界对《公论》的反应时说:“近日来,曾访问各方面人士,询问阅读《公论》后的感觉,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公论》甚好,通过阅读这一杂志,对致公党印象颇佳”。各地致公党组

织纷纷来函要求多寄些刊物,“各民主政党和进步社团,都来函要求……交换刊物”。

但止于1949年5月10日,《公论》第6期出版后,《公论》停刊。自1949年5月以后,致公党全党的精力放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和迎接解放军解放广州以及广州解放后协助政府做好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接着,致公党总部又忙于从香港迁至广州的准备。年底,在完成了迁移工作后,1950年初即投入为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所以自《公论》第6期出版后,全党实无力顾及持续出版;加以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发生了变化。因此,继续出版发行《公论》已经没有必要了,这也是建国后不再复刊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公论》的出版发行,在致公党自1925年成立以来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其意义十分重大:《公论》以一个新民主主义政党喉舌的面貌,参与国内的政治斗争展现了致公党作为一个新型政党日趋完臻和成熟的形象;而对于致公党党内来说,总共6期的《公论》,发表了致公党的纲领、宣言、声明等大小文件共同31件,此乃是今人研究致公党历史的重要依据,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公论》虽然停刊,但《公论》的艰苦创业精神永远流传。当时致公党在编辑出版《公论》时,其条件相当艰苦困难,这种为革命而艰苦创业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光大。

主要参考论著:

- 1、中国致公党文史委员会.中国致公党文件选编(上、下册).中国致公出版社,1995年5月
- 2、黄鼎臣纪念文集.华文出版社,2000年9月
- 3、陈其尤.陈其尤自传.中国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 4、伍觉天.从事致公党工作46年.中国致公党广东省委员会,1994年9月
- 5、王培智、徐放.陈其尤与中国致公党.江苏致公.2002年3、4期、2003年1、2期.中国致公党江苏省委员会主办

注释:

- [1]致公通讯.1990年第7期
- [2]永远跟着时代前进.致公通讯.1957年第16期
- [3]致公通讯.1991年第4期
- [4]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第767页

(责任编辑:冯菊红)